

## 青年王士禛的心理轉折——從明湖、 紅橋到水繪園的療癒敘述

黃靜妃\*

〔摘要〕

中國明清兩朝，因時代的鼎革變異，產生龐大失落感的遺民族群，在自我定位與大環境之間，努力地掙扎適調，進而形成文學上特殊的風貌。王士禛無異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幾是以「泰山北斗」之姿，左右「一代風氣之所主」。然而，出生於明崇禎七年（1634）的王士禛，到清世祖順治帝入關平定流賊，定鼎改元時也已是十一歲略識人事的少年，遺民意識是否對王士禛產生影響？他又如何看待自己的遺民身分？他如何從一個所謂的前朝遺民，過渡到當朝新貴的館閣重臣？又如何從詩人文士轉換至士大夫官員？本文嘗試以王士禛與當時文士唱和所流傳下來的詩文作品作為研究入徑，探討王士禛在他價值觀念與人格形成的青年時期的心理轉折，這些轉變是否意味著一個面對傷痛，啟動療癒的開始？特別是順治十四年（1657）作於大明湖啼聲初試的〈秋柳詩四首〉，由自我內在的探索，到謁選揚州推官任內，康熙元年（1662）與康熙三年（1664）兩次修禊紅橋，分別留下〈紅橋絕句二首〉與〈冶春絕句二十首〉，以及康熙四年（1665）修禊冒辟疆水繪園賦作〈修禊水繪園詩十首〉與〈再泛水繪園看月作二首〉，這些作品提供了理解王士禛內在心理轉折的最佳素材。蔣寅：「清詩不是在錢牧齋手中，而是在王漁洋手中展現出自己的風貌，奠定自己的理論基礎。」肯定了王士禛在清詩上的地位。而嚴志雄則認為〈秋柳詩〉是「王士禛向清朝意識形態靠攏的抒情／道德主題幽然浮現」，同時也「與王士禛的考試壓力與入仕焦慮大有關係。」青年時期的王士禛作品，呈現出王士禛面對家國巨大傷痛，嘗試自我詮釋與定位，摸索方向，進而達到自我療癒的敘述過程。

關鍵詞：王士禛、秋柳詩、冶春詩、水繪園、療癒敘述

---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一、前言

中國傳統文學發展到清朝，可稱得上是最後一個盛世清音，詩歌、詞賦、小說、戲曲等體裁，彷彿預知到表演的舞台與欣賞的觀眾即將消逝般，而傾全力地盡興演出。特別是明清之際，因時代的鼎革變異，產生龐大失落感的遺民族群，在自我定位與大環境之間，努力地掙扎適調，進而形成文學上特殊的風貌。王士禛更是以「泰山北斗」之姿，左右「一代風氣之所主」，<sup>1</sup>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然而，出生於明崇禎七年（1634）的王士禛，到清世祖入關平定流賊，定鼎改元國號大清的順治元年（1644），已是略識人事的十一歲少年，王士禛身處如此巨變，影響所及，青年王士禛對於遺民身分與狀態如何因應自處？文學作品常常在敘述中折射出個人內在的心理轉折。驗證王士禛一生顯達的宦途，當時遺民族群對正值青年，亟欲大展身手的青年王士禛所做的讚美揄揚，肯定是幫助他日後能「聲動天下」<sup>2</sup>的重要推手。

因此，王士禛如何看待他的遺民身分？或者，王士禛事實上並未有強烈的國破家亡滄桑感，他是如何調整自己，從一個所謂的前朝遺民過度到當朝新貴的館

<sup>1</sup> 「……余惟公以詩古文詞宗盟海內五十餘年，海內公卿大夫文人學士，無遠近貴賤，識公之面聞公之名者，莫不尊之以為泰山北斗。凡公所撰著與其所論定，戶誦其說，得一言之指示奉為楷模，經一字之品題推為佳士。蓋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而一代風氣之所主，斷歸乎公，未有能易之者也。」見清·王士禛撰，清·惠棟註補：《王士禛年譜》附錄一——王揆〈誥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月1版1刷），頁99。

<sup>2</sup> 「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詩集，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說，如《聊齋誌異》之類，士禛偶批數語於行間，亦大書王阮亭先生鑑定一行，弁於卷首，刊諸梨棗以為榮。……故國朝之有士禛，亦如宋有蘇軾，元有虞集，明有高起，而尊之者必躋諸古人之上。」見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精華錄十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冊四），卷173，頁3078。此外，〈漁洋詩文集序〉分別收錄眾人的撰序讚揚，錢謙益：「王君起東海，七葉光漢紹。騏驎奮蹴踏，萬馬喑不驕」；汪琬：「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縱橫馳驟，無所不可，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字，……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李敬：「他日廟堂之上，以文章揚一代之盛者，必先生也，予無以測其至矣。」清·王士禛撰，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詩文集之二——漁洋詩集序（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6月第1版1刷），頁134、136、137。

閣重臣？如何從詩人文士的腳色轉換至士大夫官員？簡而言之，王士禛在他價值觀念與人格形成的青年時期，這些轉變是否意味著一個面對傷痛，啟動療癒的開始？透過與當時文士唱和所流傳下來的詩文作品，正是觀察王士禛療癒敘述的最佳入徑，特別是順治十四年（1657）二十四歲時，作於大明湖啼聲初試的〈秋柳詩四首〉，由自我內在的探索，到康熙元年（1662）與康熙三年（1664）兩次修禊紅橋，分別留下〈紅橋絕句二首〉與〈冶春絕句二十首〉，以及康熙四年（1665）修禊冒辟疆水繪園賦作〈修禊水繪園詩十首〉，乃至康熙五年（1666）〈趙北口見秋柳感成二首〉下自註：

順治乙未，予上公車，與家兄司勳、傅彤臣御史賦柳枝詞於此，忽忽十餘年矣。堤柳婆娑，無復曩時，不勝攀枝折條之感，因賦是詩。<sup>3</sup>

「秋柳」如故，而觀看者在時間的遞嬗下，自然生發「攀枝折條」的悵然，其中的心理轉折，或許已然啟動也開始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自我療癒。創作者的內心世界，時常隱身在文字裡，但同時也不免在文字中現身，因此，從文學創作中隱然呈現出來具體成形的詮釋，是了解王士禛內心世界的真切素材。本文嘗試從這些作品中，關注王士禛的心理轉折，爬梳整理，從大明湖到水繪園，正是王士禛以抒情言志來詮釋自我，隱含自我療癒的敘述過程。

## 二、轉變的開始：秋柳世界裡詩人文士的身影

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王士禛還是個沒沒無聞的讀書人，僅是通過鄉試舉第六名而仍未通過會試的青年士子。<sup>4</sup>是年，他於家鄉大明湖集諸名士東武邱海石、清源柳公籙、任城楊聖宜、益都孫仲儒等，舉秋柳社集會賦詩，一舉成名，造成「賦〈秋柳詩四首〉，詩傳四方，和者數百人」的盛況，<sup>5</sup>王士禛也因為〈秋

<sup>3</sup> 清·王士禛撰，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詩文集之二——漁洋詩集卷十九·丙午稿（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6月第1版1刷），頁446。

<sup>4</sup> 「順治八年辛卯（1651），十八歲，應鄉試，舉第六名。……順治九年壬辰（1652），十九歲，會試被落，伯兄舉禮部。」清·王士禛撰，清·惠棟註補：《王士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月1版1刷），頁20-21。

<sup>5</sup> 同註4，《王士禛年譜》惠棟註補引〈菜根譚詩集序〉云：「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

柳詩〉得到當時遺民詩人的支持與褒揚，為日後宗主詩壇奠立初步的根基。王士禛為何能獲得遺民詩人的青睞，主要可從兩方面來觀察：

### （一）以朦朧的意象承載故國之思

王士禛在清初詩壇嶄露頭角，除了二十八歲時受到大家錢謙益「驥騏奮蹴踏，萬馬暗不驕」的讚揚外，其實早在順治十四年，二十四歲未殿試任官職前，在家鄉歷下以〈秋柳詩四首〉一鳴驚人，獲得詞家耆宿的推挹揄揚。當時的詩家詞人並無法預知王士禛將來會「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但王士禛〈秋柳詩〉的成功不得不歸因於獲得明末遺民的青睞，因他將歷史的滄桑與朝代的興亡在山水景物的朦朧意境中表露出來。明末遺民對王士禛的厚愛乃基於惜孤與愛才，因王士禛的先祖在明朝是科舉世家，先祖伯祖曾任刑部尚書、國子監祭酒等職位，在清兵南下，新城陷落時，王家勇敢地投入抗清活動，且傷亡慘重，家族中被殺及自殺者三十餘人，王士禛的母親亦自縊而未死。因此，當王士禛寫出：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鸝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秋柳詩其一〉<sup>6</sup>

青年王士禛使用眾人耳熟能詳的詩句典故「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以寄託黍離之悲時，王士禛的身上，匯集了故國在空間消失與時間斷絕的雙重現狀，此時，明朝臣民亡國遺民的家國之思，不免投射到

---

秋賦，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右三年，予至廣陵，則四詩流傳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重。於是〈秋柳詩〉為藝苑口實矣，頁14。又《阮亭詩選》卷四〈丁酉詩〉自序：「丁酉春，濟南諸州邑苦旱，其夏秋又苦雨潦。於端居多憂，篇什稍減。八月在明湖，與諸公文讌於北渚之亭，時秋水始波，涼吹初起，亭下楊柳漸就黃落，偶有蘭成枯樹之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幾遍海內，為近今詞流美譚。然蕉萃搖落，殆成詩讖。今居廣陵，回憶曩事，才知旦暮，為之慨然嘆息。」引文見蔣寅撰：《王漁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0月1版1刷），頁31。

<sup>6</sup> 清·王士禛撰，清·惠棟注：《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卷五上——今體詩一〈秋柳詩四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2月2版影印本），頁51。

這位前朝名臣之後，〈秋柳詩〉無異是故國鄉愁最好的載體。〈秋柳詩〉喻有寄託興亡之感是最普遍且廣被接受的說法，即使嚴迪昌在《清詩史》中曾提出不同見解，<sup>7</sup>但是由於唱和〈秋柳詩〉的文士人不下數百人之多，越多的文本資料被發現與研究，也就產生更紛紜的說解。經過中研院嚴志雄的歸納，大致以緬懷故明、為明藩故伎所作、弔南明福王舊事、詠明濟南王故宮等說法較周延。<sup>8</sup>王士禛在詩句中借含蓄朦朧的方法抒發情感，運用歷史上懷思故國的典故，激起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在充滿神韻、含蓄深微的風格中，遺民找到了想像家園故國的寄託。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婦鏡，江幹黃竹女兒箱。  
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琅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摻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裡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仇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烟。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  
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  
〈秋柳詩其二、三、四〉<sup>9</sup>

<sup>7</sup> 嚴迪昌《清詩史》第二章〈「絕世風流潤太平」的王士禛〉一文中，提出數條證據表示不同意〈秋柳詩〉是王士禛的弔明亡之作，根據嚴氏的考證，王士禛是為明福藩故伎所做，「〈秋柳詩〉本事由鄭妥娘之類女子身世起興，而諷責福王朱由崧禍國，自取覆亡，似最妥切題旨。」參見嚴迪昌撰：《清詩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8年10月初版），頁416-423。

<sup>8</sup> 關於王士禛〈秋柳詩〉的研究，嚴志雄是由顧頡剛女顧洪：〈記芬陀利室所藏《王漁洋柳洲詩畫圖》卷〉一文，1993年發表在《文獻》1993年第3期，直接找到原圖，再依據圖上所書的文字深入研究而得。詳見嚴志雄撰：《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導論（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15。

<sup>9</sup> 同註6，〈秋柳詩之二〉〔惠注〕徐夔曰：樂府〈琅琊王歌〉：「琅琊復琅琊，琅琊大道王；陽春二三月，單衫綉襦。」許立賢曰：《世說·言語篇》：「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琊王時楊柳，皆以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頁53。〈秋柳詩之四〉〔惠注〕徐夔曰：魏文帝〈柳賦序〉：「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予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頁54。

孫康宜對〈秋柳詩〉的盛行有進一步的解釋：

究其原因，〈秋柳詩〉之所以能在文壇上引起如此重大的反響，與其特殊的藝術手法有著密切的關係。蓋該詩所採用的含蓄手法，除了在文字與意象方面給人一種朦朧美以外，它正好也巧妙勾起了一些「敢悲而不敢言」遺民情緒。<sup>10</sup>

王士禛在〈秋柳詩〉中有意大量地使用「洛陽」（「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秋柳詩其二〉）、「靈和殿」（「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裡昔人稀」〈秋柳詩其三〉）等昔日的地名遺址，將眼前的愁思隱藏在歷史的陳蹟中，如嚴迪昌《清詩史》篤定地認為〈秋柳詩〉乃為福王故妓而寫的說法，恐怕是昧於事實。但全詩用「含蓄手法」呈現出來的「朦朧美」、「敢悲不敢言的遺民情緒」，是王士禛刻意地有所迴避嗎？或是這種形式正是余英時所謂「以隱語傳心曲，其風莫勝於明末清初。蓋易代之際極多可歌可泣之事，勝國遺民既不忍隱沒其實，又不敢直道其事，方中履所謂『諱忌而不敢語，語焉而不敢詳』者，是也」。<sup>11</sup>

從揚州推官到入京任禮部提督兩館主事，王士禛清楚地意識到描寫山水的朦朧煙雨神韻，是位於新朝與故國之間的安全區域，換言之，王士禛選擇在文學上運用「神韻」來緩和兩者之間的緊張與對立。李明軍「神韻：順康之際時代情緒的文學表現」對王士禛此時的文學以表現神韻詩意，有詳盡的歸納。

所謂神韻，以清高出世思想為內核，追求寧靜幽遠意境，將歷史滄桑淡化為若有若無的感傷，將政治虛化為遙遠的背景，一方面適應清廷淡化漢仁民族情緒與故國之思之需要；另一方面又為民族情結一時難解的漢族文人，於文化專制逐步加強之時，找到為清廷所容忍的情感宣洩口。<sup>12</sup>

<sup>10</sup> 孫康宜撰：〈典範詩人王漁洋〉，收錄在陳平原、王德威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初版二刷），頁550。

<sup>11</sup> 余英時表示在考察方以智晚節的相關資料時，「尚別有一重困難而通常考證之所無者，即隱語系統之破解是也。……故考證遺民事迹者非破解隱語不為功」。詳見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增訂版自序（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2年1月初版一刷），頁3。

<sup>12</sup> 李明軍撰：《文統與政統之間——康雍乾時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學精神》（濟南：齊魯書社，

不論是遺民身分的不得不「隱」，或是文學創作技巧的運用，王士禎選擇以「朦朧神韻」展現文學，是否也企圖從現實中重新界定自我，迎向未來的嘗試？隱藏起來的或許有無以言說的傷痛記憶、無奈現實，但同樣地，也為自己提供了復原療癒的最佳防護。

## （二）以謹慎的態度面對政治議題

政治是一種表現自我詮釋的面向，即使是打算在官場上有所作為的青年人王士禎，詩文創作未必全然以政治考量為視角，由他與兄長王士祿身為前朝仕族之後，但仍參加場屋之試，雖然是「山人少抱微尚，慕孟襄陽之為人，學不為仕。以門祚中替，外侮時藥，祖父督警，遂眵勉場屋，以甲科起家」，<sup>13</sup>當大環境改變，而個人生存又受到威脅時，不事二姓的態度自然逐漸軟化，因此，遺民情結委實對王士禎並無太大影響。其次，由他在創作中不刻意挑起政治議題，與遺民詩人交遊多偏重於談詩論藝，而不去碰觸政治敏感話題。嚴迪昌指出：「但是，王士禎有一點是絕對謹慎的，即凡遺民野老們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雅集活動絕不介入」，<sup>14</sup>張宇聲也主張：「漁洋在揚州與遺民詩人的交往中，往往稱論其詩藝，稱引一些寫景名句，而避開了那些政治傾向鮮明的詩作」。<sup>15</sup>甚至王利民也認為兄弟兩人「選擇的是依附清廷重振家門的道路。……王士禎竭力以名士的身分出交當世文人，在詩歌創作上則以抒發『盛衰之感』保持一種不偏不倚兩面討好的姿態」。<sup>16</sup>對於政治議題的謹慎，學者各提出不同的詮釋，但個人認為，王士禎對政治的警覺，未嘗不是提供後人了解王士禎如何在受惠於遺民的氛圍中，仍能在新舊群體之間保有適度的距離與獨立？

---

2008年11月1版1刷)，頁176。

<sup>13</sup> 參見清·王士禎撰，清·惠棟註補：《王士禎年譜——〈王考功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月1版1刷），頁82。

<sup>14</sup> 參見嚴迪昌撰：《清詩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8年10月初版），頁428。

<sup>15</sup> 參見張宇聲撰：〈王漁洋揚州文學活動評述〉，收錄在《淄博師專學報》（1996年1月），頁52。

<sup>16</sup> 「明亡未久，所謂故國恩澤尚在人心。在充滿華夷之辨的讀書人心目中，仕清還不是一分榮耀的事情。王士禎竭力以名士的身分出交當世文人，在詩歌創作上則以抒發『盛衰之感』保持一種不偏不倚兩面討好的姿態。遺民故老們將這種感傷的情調認同為故國之思的變奏，視為哀號之後的呻吟，而新朝才俊含英咀華俱在情味」。參見王利民撰：《王士禎詩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1版1刷），頁43-44。

從他與陳維崧、冒辟疆書札往來、詩文酬答與禮物餽贈的頻繁，<sup>17</sup>建立緊密起私人情誼看來，王士禛並不忌憚與明遺民交往，甚至於是有意的交往。然而，這種有意的交往，是否一定如嚴迪昌所謂「權術心機相輔而行」的謀略？<sup>18</sup>筆者並不贊同嚴迪昌《清詩史》中由權謀的觀點解釋對王士禛自我的政治詮釋，因為從王士禛自撰的年譜，以及較晚期所寫的《池北偶談》，對揚州時期的布衣之交並沒有刻意略而不談，甚至於《漁洋山人感舊錄》一書中亦收錄了許多明代遺民酬答交遊之作，因此，單憑《居易錄》一段王士禛的自述交友名單中不載錄布衣遺老，而認定他在揚州的人際互動必然是權謀操弄，實是偏頗之見。

此外，當時與王士禛詩文往來、編選點校的文人，同時兼具各種身分地位，可由謝正光〈就〈秋柳詩〉之唱和考論顧炎武與王士禛之交誼〉一文中，就和作〈秋柳詩〉著名的八位當代文士：顧亭林、徐東癡、冒辟疆、曹溶、陳維崧、王士禛、朱彝尊、汪懋麟等人得到印證：

知當日和〈秋柳〉詩者，實括有明之遺民、清初之貳臣、幕客、囊筆遊食四方之文士，以及清人所培育之第一代官吏。清初士人之政治抉擇，此八人已囊括無遺。故阮亭〈秋柳〉之和作，實與其人之政治操守無關。<sup>19</sup>

至於孫康宜〈典範詩人王漁洋〉一文則主張王士禛在揚州的交遊是政治光環下的

<sup>17</sup> 王士禛與冒辟疆往來頻繁，情誼深厚，由蔣寅《王漁洋事迹征略》「康熙三年在揚州推官任」條下引用一件小故事可知，王、冒兩家交情匪淺。「五月初，陳維崧來揚州，攜冒辟疆內人所制紈扇約履等端午節禮。冒辟疆附書慰問西樵之禍，又以詩集稿請點定」，頁109。「西樵之禍」指的是王士禛主河南鄉試時詩文句有疵，被奪俸三個月，繫下刑部一事。冒辟疆詩文集《同人集》中大量的書札、詩賦、文記同樣地記錄王士禛在揚州時兩人的親密互動。王士禛〈修禊水繪園八首〉即是專為此而做的七言古詩，關於王、冒兩人的交遊資料甚多，可參閱顧啟撰：〈冒襄王士禛交游考〉，《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2期（2006年6月），頁53-54。

<sup>18</sup> 「更可注意的是，《居易錄》有一大段自述生平交遊的文字，先後開列了數十百人的友朋名單，幾乎全皆為官宦縉紳詩人，而略過不提廣陵時期的布衣遺逸之交。……從中不難看出，漁洋山人的詩學學術交遊與酬應活動，實在是多與權術心機相輔而行的。」《清詩史》，頁429-430。

<sup>19</sup> 參見謝正光撰：〈就〈秋柳詩〉之唱和考論顧炎武與王士禛之交誼〉，收錄在《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頁392-438。



映襯，是被明朝遺老認定的「成功的文化接班人」，如此說法在時間上的斷限上恐怕有前後的矛盾。

王士禛之所以被稱為「一代正宗」，乃因這些明朝遺老認為他可以做一個很成功的文化接班人。尤其在異族的統治之下，能像王士禛那樣既得到仕途的亨通，又符合遺民的藝術趣味的年輕人，實在不多見。可以說，王士禛在當時的政治地位對遺民文化的延續起了一個很大的補助作用。<sup>20</sup>

王士禛被視為「文化接班人」是當時遺民的心理投射，但就此認定倚靠王士禛日後的亨通仕途，明代文化得以延續，就時間先後的進展，這個推論是錯誤的。幼有「聖童」之稱，二十四歲又以〈秋柳詩〉（1657）聲動天下的王士禛，一路專注於攻文章舉科第的大業，恐無心或也不知處理八歲時目睹母親殉節未成，賴己援救得以存活而受創的心理傷痕；<sup>21</sup>雖有意仕途，但貢生（1655）名次第五十六名的成績，對於舉業，王士禛既要承受榮耀先祖輝煌仕宦成就的責任，又須面對不甚優異的考試結果，對於未來，王士禛內心的焦慮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嚴志雄據王士禛隔年赴京應試殿試（1658）以二甲三十六名進士及第，表現平平，不得與館選回溯推論王士禛當時的狀況，「〈秋柳詩〉的「滄桑之感」是由於過往考試的不愉快經驗，以及對殿試的焦慮而生發的」？<sup>22</sup>

殿試結束，直至（1659）謁選派任揚州推官，據其兄王士祿《漁洋集外詩》序記載，王士禛得知新職後的心情是抑鬱忐忑，憂愁而不得志。

<sup>20</sup> 孫康宜撰：〈典範詩人王漁洋〉，收錄在陳平原、王德威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初版二刷），頁553。

<sup>21</sup> 「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經東閣中，以髮覆面。初，先宜人與張對縊，先宜人繩絕不死，時夜中，喉咯咯有聲，但言渴甚。士禛方八歲，無所得水，乃以手掬魚盞冰進之，以書冊覆體上。又明日，兵退，得無死，視張則久絕矣」。參見王士禛：〈五烈節家傳〉，《王士禛全集》，頁1682。

<sup>22</sup> 關於王士禛〈秋柳詩〉所涵蓋的意涵，嚴志雄在《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第一章〈科舉、秋柳、變調——王士禛〈秋柳詩四首〉新探〉一文中有詳盡的考證舉例，極富參考價值。（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7-71。

吾弟貽上，蚤負夙惠，苕苕秀穎，爰自總角，神姿清澈，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戊戌薄遊京師，不得志，幽憂抱疾歸。己亥謁選人，得揚州法曹，日埋頭簿書判牒，說者皆為貽上悲其遇，嗟其負振古之才，而淪落江鄉，憔悴以至此。<sup>23</sup>

況且王士禛在揚州期間的「當時」，僅是一名忙著處理揚州積欠朝廷稅賦的刑官，<sup>24</sup>遺民們如何得知眼前這位年輕官員王士禛日後會飛黃騰達，官居禮部、刑部提督、翰林院侍講學士，而將漢文化復興的重責大任完全押注在這位年輕人身上呢？因此，王士禛由大明湖嶄露頭角開始，面對新舊政權交替帶來的價值衝突，當「遺民不只是一種身份，而且是一種狀態、心態時」，<sup>25</sup>王士禛因為個人成長經歷，特別是幼齡面對母親殉節自縊未成，母親日後卻又以督促兒輩考取她當年不惜一死反對的政權功名，以慰先祖作為課子的重心「兒輩今讀書家塾，父母日望攻文章，取科第，異時遊宦四方」。<sup>26</sup>盱衡當前現狀，滿州入的政權逐漸穩固，南明諸王殘喘敗退，當過去的記憶成為傷痛，遺忘或是變形，都可視為啟動療癒的開始。不論遺忘的是淡薄的遺民意識，或是焦慮的科舉應試，變形的是積極地在仕途上求發展，詩人文士仍是青年王士禛對自我的最主要詮釋與表現，也是個人思索後的自我定位。

<sup>23</sup> 參見王士禛：《漁洋集外詩》序，《王士禛全集》，頁 530。

<sup>24</sup> 參見《王士禛年譜——康熙五年丙午條下》，頁 26-28。至於惠棟注補「山人官場揚州，比號繁劇」，「比號繁劇」正是形容揚州官吏難為，據劉錚雲撰：〈「衡、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份（1993 年），頁 176-178。「地當孔道曰衡；政務紛紜曰繁；賦多逋欠者曰疲；民刁俗悍、命盜案多曰難」，揚州倒是符合了衡、繁、疲三個標準，揚州推官肯定不是個位高權重的閒差事。

<sup>25</sup> 參見趙園撰：《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第七章〈時間中的遺民現象〉，談論遺民是一群被時間剝奪卻也恢復無望的人，處於被世界遺忘，卻又不得遺留在世上的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1 版 3 刷），頁 314-338。

<sup>26</sup> 參見王士禛：《漁洋文集卷十·行狀、行述》〈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王士禛全集》，頁 1682。

### 三、自我療癒的進行與完成——官員與詩人身分的越界流轉

順治十六年（1659）王士禛二十六歲，以殿試二甲進士謁選為江南揚州府推官，翌年赴任就職，「庚子士禛赴揚州推官，母送之灑水上曰：『汝少年為法吏，吾懼之。然揚故爾祖舊游地也，吾與爾父少嘗隨侍。今三十年，風景猶夢寐見之，孺子行矣，惟爾祖是程，俾揚人謂王公有後，是吾志也』」。<sup>27</sup>王士禛可說是肩負著重振家聲的心情來到揚州，揚州曾是他的祖父的轄地，對初踏上宦途首站的王士禛而言，揚州不只是一個地方，而是充滿「地方感」、「被賦予了意義」的空間。<sup>28</sup>若作品是詩人內在世界的呈現，「作品作為表現而言，則不僅是表現此時此地的心境、物境，它更希望能表現作者的整個人格理想」，<sup>29</sup>王士禛筆下的揚州，在他的生命經驗裡扮演著信心重振的意義。

#### （一）冶春詩裡的信心重建

〈冶春絕句〉<sup>30</sup>是王士禛任職揚州推官修禊紅橋時作，其中以春風、桃花、海

<sup>27</sup> 同註 26，頁 1683。

<sup>28</sup> 「地方感」的概念主要以段義孚（Tung Yi-Fu）、麥克·克朗（Mike Grang）人文地理學者的觀點為主，人文地理學者受到現象學及存在主義的影響，是一種主觀的地理學知識，強調自我經驗在空間上的投射，因為一個地方，即是被主體我佔有居存的空間，在其中不斷生發存有意義，使此原本空洞、抽象的空間轉化成涵詠蘊具人文與生命意義的空間。地理空間是人的意向性和意義的地理空間，著重於人的生活之直接經驗。相關論點參見段義孚（Tung Yi-Fu）撰，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1 版 1 刷），頁 63-78，頁 129-143。麥克·克朗（Mike Grang）撰；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等譯：《人文地理學 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巨流出版社，2009 年 9 月初版 4 刷），頁 57-78，頁 133-148。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撰，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在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 年 12 月增訂再版 4 刷），頁 81-103。

<sup>29</sup> 參見高友工撰：《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 5 月 1 版 1 刷），頁 79-80。

<sup>30</sup> 「余少時在廣陵，每公事暇，輒召賓客泛舟紅橋，與袁荊州于令諸詞人賦詩，有『綠陽城郭是揚州』之句，江淮間取作畫圖。又與林茂之、張祖望、杜于皇、孫豹人、程穆倩

棠等典型春天意象為敘述主體的作品佔了絕大多數，除了描寫紅梅似雪、桃花灼灼，花團錦簇的春天景色外，連紅橋的海棠盛開，都被視為有艷冠蘇東坡柯丘海棠的氣勢，「海棠一樹淡胭脂，開時不讓錦城姿。花前痛飲情難盡，歸臥屏山看折枝」（冶春絕句之十一）。如此旖妮景致，再輔以文人雅士的遊讌，揚州紅橋頓時成為揚州第一景，符合夢香詞所云：「揚州好，第一是紅橋」，〈冶春詩〉也成為當時「獨步一代」的佳作。

紅橋在平山堂法海寺側，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名士遊讌，於是過廣陵者多問紅橋矣。宋商邱曰：「阮亭謁選得揚州推官，游刃行之，與諸士遊讌無虛日，如白、蘇之官杭，風流欲絕」。劉體仁曰：「采明珠，耀桂旗，麗矣。或率兒拜，或袂從風，如欲仙去，冶春詩獨步一代」。<sup>31</sup>

紅橋由普通的私人花園，因為王士禛的參與而聲名大噪，王士禛也從揚州紅橋獲得眾人的肯定與讚譽。當一個標記著先人功勳榮耀的地方，因為自己的作品而重新被注目，除了榮宗耀祖起斷落了的家族輝煌之外，對於原先不以赴任揚州為喜的王士禛，透過描繪紅橋的〈冶春詩〉，由詩句裡的明亮語調，與對歷史陳跡的平靜以對，無喜無悲，公務之餘，從容優游於紅橋的春光裡，江南的蝴蝶流鶯，烏衣巷裡的王謝風流，暮春三月，蘭亭脩禊，安置了王士禛仕途上的短暫失落，重拾起對未來前途的信心。

今年東風太狡猾，弄晴作雨遣春來。江梅一夜落紅雪，便有天桃無數開。  
野外桃花紅近人，穠華處處照青春。一株低亞隋皇墓，且可當杯酒入唇。  
東家蝴蝶作團飛，西家流鶯聲不稀。白苧新裁如雪色，前來花下試春衣。

修禊於此，自賦〈冶春詩二十首〉。陳其年題其後云：『官舫銀鐙賦冶春，琅琊風調更誰倫？玉山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壟罩人。』宗定九元鼎詩云：『休從白傅歌楊柳，墨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清·王士禛撰：《漁洋詩話》，卷上，收錄在郭紹虞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1版1刷），頁165-166。完整的〈冶春絕句二十首〉可參閱《王士禛全集——漁洋詩集卷十五》，頁385-388。

<sup>31</sup> 參見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卷十——紅橋錄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1版第5次印刷），頁221。

永和之歲暮春月，王謝風流見典型。好記甲辰布衣飲，竹西亭子是蘭亭。  
〈冶春絕句二十首之一、二、四、二十〉<sup>32</sup>

美國學者梅爾清將紅橋成爲江南文化重地歸功於王士禛，一個地方因爲文人、文學或是文化活動（脩禊）的介入，讓地方產生更豐富與無形的面貌與風味，甚至遠超過它實質的存在，重新開創出新的意義，揚州與紅橋正因王士禛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sup>33</sup>《揚州畫舫錄》紀載在紅橋舉行脩禊的，王士禛並非第一人，<sup>34</sup>但王士禛卻是讓紅橋脩禊成爲揚州的表徵，兩者相互作用，正符合了梅爾清的研究觀察。揚州是個歷史悠久的古城，王士禛兩次脩禊紅橋，分別創作〈紅橋絕句二首〉與〈冶春絕句二十首〉；特別是第一次脩禊紅橋，用素樸直接的文字，寫下紅橋在柳絲輕風中的美景，曾是綴滿南朝金粉的隋宮，保持了與歷史一樣靜謐的姿態，被輕柔蜿蜒的細水環繞著，但這樣的景色已蔚爲「一郡之麗觀」。

舟入紅橋路，垂楊面面風。銷魂一曲水，終古傍隋宮。  
水榭迎新秋，素傳自孤往。漠漠柳絲飛，時時落波上。  
〈紅橋絕句二首〉<sup>35</sup>

<sup>32</sup> 《王士禛全集——漁洋詩集卷十五》，頁 385-388。

<sup>33</sup> 「迄今還沒有看到在王士禛到達揚州之前人們對紅橋的描述，所以說這個地方與王士禛有著斬割不斷的關聯。」梅爾清（Tobie Meyer-Fong）仔細地分析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脩禊的文化活動與旅遊，揚州與紅橋均因王士禛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參見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撰，董建中譯：〈綠楊城郭是揚州——清初揚州紅橋成名散論〉，《清史研究》（2001 年 11 月第 4 期），頁 111-124。

<sup>34</sup> 「爾堪，江都人，常從李文襄公討耿逆，為右前鋒。……六年以老母辭歸，放情山水。嘗于上巳日與孔東塘、吳菌次、鄧孝威……文閔義行紅橋脩禊，此在漁洋之前」。參見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卷十——紅橋錄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 1 版第 5 次印刷），頁 241。

<sup>35</sup> 《王士禛全集——漁洋詩集卷十三》，頁 352。此詩在《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卷五下——今體詩二〈紅橋二首〉》，惠棟注：「〈吳綺揚州鼓吹詞序〉紅橋在城西北二里，崇禎間形家設以鎖水口者，朱欄數丈遠，通兩岸，雖彩虹臥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雕楹曲檻，鱗次環繞，綿五十餘里。春夏之交，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於其間，誠一郡之麗觀也。」

關於紅橋的創作，描寫江南秀麗的山水外，充滿歷史傳說的名勝古蹟當然也是啓興詠懷的創作題材，只是，王士禛處理這些交雜興替盛衰的素材時，他並沒有太多的以古諷今，借題發揮，尤其是牽涉到明清之際的史實或人物，他仍秉持一貫對政治的謹慎態度，陳述歷史而不輕易觸景傷情。如果文字是人們內心的投射，治春詩句透露了王士禛在揚州日漸穩定自在的心境。當王士禛即將離開揚州，北上京城任職禮部，回首五年揚州平山堂歲月，讓他浮現腦海懷念不已的，不是自己在宦途上一路的拚搏奮力，而是尋常生活裡，小販棗杏瓜果之類蜜甜「乾飴」的叫賣聲。<sup>36</sup>

東風花事到江城，早有人家喚賣錫。他日相思忘不得，平山堂下五清明。

〈治春絕句二十首之九〉

當年鐵炮壓城開，折戟沉沙長野苔。梅花嶺畔青青草，閑送遊人騎馬回。

〈治春絕句二十首之十三〉

此詩寫史可法在清兵南下，城破時死守揚州城，最後連屍骨亦不得尋葬衣冠於梅花嶺的史事。字裡行間讀不出控訴或感傷，往事已為陳跡，鐵炮兵戟蒙銹苔，雖不致成為狐蹤兔穴，衰草牛羊野，但王士禛眼前的梅花嶺，已成遊人縱馬閒逛的青青草原，相同的空間，在詩人筆下已然有不同的詮釋，青史上的血淚，因為王士禛心理沉穩不再傷逝而凝固在塵封的歷史中。

## （二）水繪園裡的蛻變逸樂

王士禛從大明湖、紅橋到水繪園，聲望與詩名與日俱增，當時文人雅士的生活樣貌，幾乎可以在這些應答酬唱的詩文中具體而微的呈現。王士禛的文名在揚州奠基，也在揚州擴展；從文學上獲得的聲譽回饋，既救贖了王士禛的創傷焦慮，也成功地銜接傳統文士學而優則仕的企圖。從文士到官員，身分的移動流轉，隱然呼應了王士禛的心理轉折；創作能量的源源不絕，幾乎同步了王士禛的敘述療癒。揚州與王士禛交互作用，相互定義，形成了王士禛筆下「萬卷詩」的豐富文

<sup>36</sup> 惠棟引〈急就篇〉、《經典釋文》、《方言》等書對「錫，乾飴也」，「錫，謂之餈錫，或云滑飴，凡飴謂之錫」的注解。參見清·王士禛撰，清·惠棟、金榮注：《漁洋精華錄集注卷三——甲辰〈治春絕句十二首之六〉》（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1月1版1刷），頁286。

本世界，惠棟註補《王士禛年譜——康熙四年乙巳（1665）條下》「山人官揚州五年，不名一錢。急裝時，惟圖書數十篋，嘗有詩云：『四年只飲邗江水，數卷圖書萬卷詩』」。<sup>37</sup>萬卷詩是文學上的誇飾，但揚州五年，王士禛的確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據李孝悌統計「從康熙元年到康熙三年，王士禛在三年間寫了三百多首詩，數量驚人」<sup>38</sup>

王士禛在揚州創作出萬卷詩，許多作品寫於酬酢宴飲的熱鬧場合，惠棟註補：「又公文章結納遍天下，客之訪平山堂、唐昌觀者，日以接踵。公詩酒流連，曲盡款洽。」又如同吳偉業形容的：「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蓋實錄也。」<sup>39</sup>但也有不少作品是公餘之後，吏散人稀「刻燭賦詩」寫成。吳偉業當時亦以詩作稱雄文壇，但他和錢謙益一樣，愛才惜才，對王士禛這位後生晚輩關愛有加，推崇備至。

王士禛雖處在劇務繁雜的揚州，但他勇敢地承擔起責任，而事實上，從文學上修補重振了的信心，正需要要一個實際運用操演的舞台來確認，揚州推官的事多繁雜，正給予王士禛展現幹練行政才華的機會。冒辟疆曾讚美他是「公實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

廣陵為江南劇郡，大吏有疑難事下之藩臬，藩臬復下之李官。黎明坐堂皇，羽書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應若流，侍吏十餘人手腕告脫。嘗以數月完欵件數千，一時齜指，推為神異。<sup>40</sup>

冒辟疆筆下的王士禛無異是個工作效率極高、條理清晰又體力過人的行政長才，各式各樣的公文到他手裡瞬間就裁示妥當，交付執行，反而是旁邊十幾個負責書記的官吏不堪負荷，振筆疾書至「手腕告脫」。同時期的吳偉業也曾撰文盛讚王士禛的行政能力：

<sup>37</sup> 《王士禛自傳年譜》，頁 25。

<sup>38</sup> 李孝悌撰：〈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一份（2005年3月），頁 89。

<sup>39</sup> 《王士禛自傳年譜》，頁 27-28。

<sup>40</sup> 《王士禛自傳年譜》，頁 28。

吾友新城王貽上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日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于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sup>41</sup>

如此卓越的公務表現背後透露出來的訊息是：王士禛是樂於仕途的！對照於先前功名未就、前途未卜時的徬徨失意，更可確信揚州五年，是王士禛生命中相當重要的一段轉變過程。相較於冒辟疆，吳偉業對王士禛在衙門裡的表現描述，增添了聲音效果，「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更顯得生動逼真，活脫一位朝廷官員虎虎生風的神態，躍然紙上。

至於王士禛的作品，施愚山對王士禛的學生洪昇稱譽之：「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成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sup>42</sup>以追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神韻，凡是不符合他強調「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要求的風格，往往不入篇章，因此，或謂王士禛的作品，較缺乏杜甫那種以反映社會現狀或庶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詩史」觀點，<sup>43</sup>所謂的社會詩風格並不只在揚州時期少見，觀諸王士禛的詩作，他努力地表現戮力從公的朝廷官員本色，但詩文作品中反而不以此為主要訴求，也不以政治上的表現來詮釋自己。李孝悌：「在眾人的交相傳頌之下，王士禛『刻燭賦詩』的浪漫不羈，就和他日理繁劇、酬應若流的神異能力一樣，成為揚州城的一項傳奇。而他顯然也樂於日以繼夜地在兩種身分間流轉。」<sup>44</sup>

<sup>41</sup> 「康熙四年乙巳（1665），……二十九日，吳偉業為程康莊《自課堂集》作序，盛稱公才」，引見蔣寅撰：《王漁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0月1版1刷），頁124。

<sup>42</sup> 清·王士禛撰，清·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卷三真訣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1月1版，2006年1月2刷），頁79。

<sup>43</sup> 參見徐國能〈王士禛杜詩批評析辨〉：「《唐賢三昧集》不選杜詩卻仍獲成功，不僅是因為漁洋名高於當代，更可能是這部詩選，以特殊的審美標準填補了我國詩歌批評史上的長期空白，滿足了同樣也對『純詩』有所追尋的讀者。」「南宋以來，杜詩乃是由人格之聖的龐大影響下走向了藝術之聖，這使得杜甫的以文為詩，板重古拙或是議論鋪敘等藝術特色，也一並得到了高度的認同。」王士禛的詩專取王維、孟浩然一脈，以清空澹遠的神韻為主，與杜詩的內容風格有所差異。收錄在《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323-353。

<sup>44</sup> 參見李孝悌撰：〈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收錄在《中央研究院



王士禛在揚州卓越的政績，為他日後近四十年的顯達的仕途奠定穩固的基礎。從文士到官員，在王士禛身上是並行不悖，毫不衝突。揚州位處交通樞紐，地利之便，官府公務及私人遊讌，往來甚為頻繁。王士禛居其中，事愈繁雜而詩文創作愈夥。

《漁洋山人集》者，揚州法曹王先生所作。先生官執法，簿書叢縛，不遑寢食。揚又孔道，大官貴客往來，擔撞不絕。李斯地者，歲草蹙，大半坐舟車中，人以此苦之。然先生每出輒喜，凡所獲詩賦，倍多於在郡時。自淮陰至三吳，所過名勝，題咏殆遍；墨雲淋漓，燁如春藪，幽如凝露。<sup>45</sup>

在王士禛的兄長王西樵與好友陳其年的眼中，王士禛在揚州的聲名，不少是在詩酒流連與繁花似錦中建立起來的。

西樵先生云：「貽上蚤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明朗照人。為揚州法曹日，集諸名士于蜀岡、紅橋間，擊鉢賦詩。香清茶熟，絹素橫飛，故陽羨陳其年有『兩行小吏豔神仙，爭羨君侯斷腸句』之詠。至今過廣陵者，道其遺事，彷彿歐、蘇，不徒憶樊川之夢也。」<sup>46</sup>

明代末期以來，地方官吏利用公餘之暇四方旅遊的風氣盛行，旅遊與賦詩是士大夫的普遍娛樂。<sup>47</sup>這項娛樂藉助身體的移動而達到空間位置的改變，再由空間的改變而激發詩人的創作，形成文本世界。

如果書寫活動是為了詮釋自己，那麼文體的選擇其實就是選擇表現自己的一個面向。作者不是反映環境的客觀中介但是也無法全然主觀率意。文體是主客觀聯繫的焦點，作者從文體的程式規範，寓意型式中恍然看見被書寫出來的在世界中的自己。……一但選擇某種文體，就彷如進入歷史文化

---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一份（2005年3月），頁90。

<sup>45</sup> 蔣超：〈漁洋集外詩序〉，見《王士禛全集》，頁514。

<sup>46</sup> 參見《王士禛自傳年譜——康熙三年甲辰（1664）條下》，頁23。

<sup>47</sup> 參見巫仁恕撰：〈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重心〉，收錄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頁98-103。

的迴廊，在一種熟悉的語句格式、典事氛圍中，完成發現當下自我同時也是再現傳統的書寫活動。<sup>48</sup>

其中以康熙四年乙巳（1665）脩禊冒辟疆別業——水繪園一事為代表。「春有事如皋，與邵潛夫、陳維崧其年、許嗣隆山濤諸名士，脩禊冒襄辟疆水繪園，分體各賦。山人得七言古體，即席成十篇。」<sup>49</sup>水繪園在如皋縣，為冒辟疆的私人別業，乙巳年在此舉行三月的脩禊活動。三月揚州，風景如畫，而江南園林之美在中國建築上又獨具的特色。明末清初的文人面對家國巨變，不少人選擇回歸故里，營建擘畫，自給自足，不齒為異姓之臣，在自家園林裡為保存華夏文化，教養後代而努力，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一書中有詳盡的敘述。<sup>50</sup>

〈脩禊水繪園即事十首〉標題上明白地註記「上巳辟疆招同潛夫其年亦史脩禊水繪園」，「招」者的主人與被「招」者的客人之間，哪些人受邀參與盛會？而那些人是其中的核心人物？透過一場脩禊活動，人際之間的權力展現昭然可見。除了是性情契合者的同好讌饗冶遊，更也是攏絡人情，權力互動的平台。應邀往來者俱是當時名士，即使有一位個性桀傲不與人同的怪人，自號「五岳外臣。性傲僻，好謾罵，人多惡之。年五十而無子，客如皋城，年八十矣」的邵潛，但他的出現，恰好是為給王士禛增色助拳，更凸顯了王士禛人際通達，在當時的影

<sup>48</sup> 鄭毓瑜撰：〈流亡的風景——〈由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強調「空間無法單純地被反映，同樣也無法完全被編造，這應該是個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的文本世界」。收錄在《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初版），頁193。

<sup>49</sup> 《王士禛自傳年譜》，頁24-25。惠棟註補：「陳其年序水繪園脩禊詩一卷，共八人：王阮亭士禛、邵潛夫潛、冒巢事襄、穀梁禾書、青若丹書、毛亦史師柱、許山濤嗣隆、陳其年維崧。詩則有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絕、七言絕，為體有六，共詩三十有八首。」王士禛原作七言古體十首，後自編《精華錄》刪去兩首取八首定稿，完整十篇可參閱《王士禛全集——漁洋詩集卷十七》，頁418-420。

<sup>50</sup> 「園林既是依處反映時代風氣、社交生活、財富身分的社會空間；也往往同時建構起園林文本空間，以文字或圖繪的脈絡取代了具體的路徑導引，形成知音交契的場域；並且經由命名、吟詠乃至具體的建設居遊行為，賦予內省式的象徵意涵，使得園林也成為一處充滿個人隱喻的生命空間。」參見曹淑娟撰：《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初版），頁9。

響力已不容小覷。

康熙乙巳，予過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被領，雙眸炯然，與脩禊冒氏水鉢池，尚能與予輩賦詩。<sup>51</sup>

水繪園脩禊從籌畫到舉行的過程，即是一件充滿美學的活動。

前年曾到湘中閣，閣外天寒水方落。西風颯颯猿啾啾，惜別懷君方杜若。  
今來三月青春深，浯溪窈窕桃花林。為君一曲答欵乃，寫作雲山韶濩音。  
〈脩禊水繪園即事十首之二〉<sup>52</sup>

「前年」據惠棟註解，指的是王士禛仍未決定參加乙巳三月修禊活動與否時，與主人冒辟疆的書信往來時談及邵潛無恙，年歲已高，但仍能賦詩一事。後來王士禛決定參加，詩中所寫即是浯溪兩岸桃花盛開，香氣撲鼻，在欵乃聲中輕舟緩行，彷彿雲山之外的仙樂佳音，極視覺、聽覺與嗅覺之娛樂。王羲之在蘭亭舉行脩禊活動，〈蘭亭集序〉中「曲水流觴」已是文人雅士春日冶遊時的浪漫典範；時至明清之際的江南，商業活動頻繁，經濟繁榮，手工業與印刷出版業蓬勃發展。到了清康熙朝，政局逐漸穩定，百姓生活日益富庶，遺民也漸漸凋零，詩人文士在江南的聚會宴集，雖風景不殊，恐難再生山河之異、去國懷鄉之思，此時浪漫行逕甚至遠超過曲水流觴。

平山堂下五清明，草長鶯飛無限情。不怪老顛裂風景，名園上日相逢迎。  
銀箏初彈阮初擘，此係留髭應十石。春衣明歲杜陵游，憶汝狂歌拓金戟。  
〈脩禊水繪園即事十首之四〉

<sup>51</sup> 清·王士禛撰：《池北偶談》（台北：廣文書局，1991年12月初版），卷十八。另《漁洋詩話卷上》亦有相關記載：「南通州邵潛潛夫，亦萬曆詩人，錢宗伯牧齋亟稱之。性孤僻，凡數異妻，晚竟無子。僑居如皋，年八十矣，苦繇役。余適以按部至縣，詰旦首謁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輿從，徒步而入。邵曰：『適有酒一斗，能飲乎？』余欣然為引滿，流連移晷，始別。縣令聞之，立除其役。」頁167。

<sup>52</sup> 見《王士禛全集》，頁419。

〈惠注〉引冒襄〈水繪庵修禊記〉：「時日已將暝，乃開寒碧堂，爰命歌兒演〈紫玉釵〉、〈牡丹亭〉數劇，差復諧暢。漏下二鼓，以紅碧琉璃數十枚，或置山巔，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瑩閃爍，與人影相凌亂。橫吹聲與管弦拉雜，忽從山上起棲鴉，簌簌不定。阮亭曰：『此何異羅星斗而聽篴笙也！』」<sup>53</sup>

更深漏靜之際，紅碧琉璃在山巔水湄，隱約閃耀，晚風習習，絲竹管弦齊揚，文士逸樂之狀，莫此為甚。這一首詩載王士禛晚年撰《漁洋詩話》時回憶了其中一段小插曲：「余與邵潛夫、陳其年諸名士，以康熙乙巳修禊冒辟疆水繪園，分體賦詩。余戲其年曰：『得紫雲捧硯乃可。』紫雲者，冒歌兒最姝麗者，為其年所眷。」<sup>54</sup>紫雲是冒辟疆的家奴，本名雲郎，冒用他換取陳維崧百首的詠梅詩，而雲郎與陳維崧之間維持了近十七年餘桃斷袖之情，陳並為他寫了一些詩篇。<sup>55</sup>王士禛建議要紫雲捧硯才揮筆賦詩，一個「戲」字透露了當時文人有遠超過我們想像的情慾角色流動，玩樂的狂放程度比之所謂性解放後的二十世紀並未遜色，甚至還多了一分婉轉幽微的詩意，境界更高一層。

詩句中「不怪老顛裂風景，名園上日相逢迎」，惠棟以王元美《藝苑卮言》紀錄楊慎（用修）在瀘洲喝醉時，「胡粉敷面，做雙丫髻插花，門生棄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的瘋癲狂放行爲，「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聊以耗壯心、遣遺年做註解。水繪園頓時在現實空間裡營造出另一個隱身或放縱的地方，可以是躺臥淨綠溪畔，耳聽天然絲竹，與清風落花相伴的幽靜田園；也允許是角色身分模糊的場域。

迴溪綠淨不可唾，碧夢陰中棹船過。落花游絲春盡閑，獨許先生此高臥。

<sup>53</sup> 參見蔣寅撰：《王漁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0月1版1刷），頁127。

<sup>54</sup> 《漁洋詩話卷上》，頁168。

<sup>55</sup> 「明末清初，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男伶做為一種奢侈品，乃與精美陶瓷、書畫、古銅器物一道，在文人士子間交換流通。人與物、個別的男伶與整個梨園，竟同時成為友朋儕間得餽贈之物，或遺留後輩，進行買賣。……男伶紫雲的身體經由這些詩作暗地流傳的方式，這些關乎渴慕與欲望的詩篇，也是我們可以勘察詩歌做為禮物而進行的交換。」參見袁書菲（Sophie Volpp）撰：〈如食橄欖——十七世紀中國對男伶的消受〉，收錄在陳平原、王德威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初版二刷），頁291-297。

劇憐風物共披襟，蕭然絲竹皆清音。永和三日今千載，坐使清風滿竹林。  
暮春三月為水嬰，棠梨葉大山禽啼。田家社酒壓缸面，雪白橙香玉練槌。  
夜聽醉頭滴春雨，曉抱提壺如潑乳。醉鄉大戶百分空，起喚花奴自過鼓。  
〈脩禊水繪園即事十首之七、八〉<sup>56</sup>

在水繪園中往來酬答的文友，不論是男伶化身女聲表演，或是文士幾近狂歡的「變身裝扮」，未嘗不是在原有的空間中，藉由身體再行心理空間的營造，層層套疊，交互滲透，形塑出王士禛在官員與詩人越界流轉中的詮釋變換，法曹經手稅賦刑罰的俗務，文士操作詩歌吟詠的雅音。當王士禛能夠融入水繪園裡友情的溫厚，或是逸樂於園中的趣味，來自新城的明朝遺民後代，恐怕已然擺脫時代的創傷，從詩人與官員的身分流轉中，自我摸索調整，從傷痛中找到穩定的力量，一步一步朝著療癒的方向，邁步向前！

#### 四、結語

王士禛的詩名與他的政治地位相輔相成，詩人之姿更早於官員之威見重當世。由家鄉賦明湖〈秋柳詩四首〉嶄露頭角，姑且不論〈秋柳詩〉是否為遺民情緒抒發出口，<sup>57</sup>但王士禛確實是挾其早慧文采履薪揚州，先是在康熙元年與康熙三年兩度脩禊紅橋，留下〈冶春絕句二十首〉，其後，康熙四年三月與邵潛夫、陳其年在如皋冒辟疆水繪園別業，舉禊事留下〈脩禊水繪園即事十首〉詩作。揚州五年對王士禛而言，文學地位的形成與建立，實有關鍵性的影響。由文壇而越界政壇，從文士官員之間的身分流轉，兩相輝映，塑造出弱冠稱詩，五十餘年海內學者宗仰如泰山北斗的聲望。

明湖、紅橋、水繪園一路下來的空間轉換，王士禛的心理轉折透過文學創作

<sup>56</sup> 見《王士禛全集》，頁420。

<sup>57</sup> 大陸學者輯錄大量王士禛作品的評述，對〈秋柳詩〉多數認為確實是引發羈愁之作。「汪琬評云：『嚴給事沆稱，東風作絮參春衣一首，如朔鴻關笛，易引羈愁，讀之良然』」，參見蔣寅撰：《王漁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0月1版1刷），頁29。又「……然於秋柳詩娟娟涼露欲為霜一首云，此詩可與板橋雜記參看。東風作絮參春衣一首云，此詩常與庾信哀江南賦並讀之」見解近似。參見鄧之誠撰：《清詩紀事初編卷六——王士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初版），頁677-679。

抒情言志，重振信心，也療癒傷痛，進而蛻變成長。青年時期的王士禛，透過個體主觀經驗賦予空間意義，而空間也供給王士禛自我療癒的養分。從〈秋柳詩〉、〈冶春絕句二十首〉到〈脩禊水繪園即事十首〉，王士禛運用了豐富的典故，優美的詞藻妝點爛漫的春光，符合高友工「抒情美典」的定義：「抒情美典的重點是在創造過程，亦即美感經驗。因此它的目的所謂內化也即是對此創造過程的某一階段或層面的保存，於是其形式自然是對此內在心象的一種象徵」。<sup>58</sup>王士禛透過詩篇抒發此時此地之情，空間的轉換透析出著王士禛面對生命的態度，以詩歌為橋樑，跨越階層、身分、地域的界線，完成了自我的療癒。王士禛的文名在揚州奠基，也在揚州擴展；從文學上獲得的聲譽回饋，既救贖了王士禛的創傷焦慮，也成功地銜接傳統文學而優則仕的企圖。從文士到官員，身分的移動流轉，隱然呼應了王士禛的心理轉折；創作能量的源源不絕，幾乎同步了王士禛的敘述療癒。揚州與王士禛共同完成了一段生命的歷練。茲以李孝悌對王士禛的評價為本文做一個結語：「像王士禛這種處在政權交替時期的士大夫，其實可以很容易地跳脫政治、族姓的紛擾，經由歷史、文化的傳承，為自己當下的情境存在，創設出更豐富的意義」，<sup>59</sup>更豐富的意義生發自王士禛的心理的轉折，翻轉出一個海內文士共矚的前程。

<sup>58</sup> 高友工：「抒情美典不常討論“人物”或“觀點”，而集中在抒情自我（lyrical self）和抒情現時（lyrical moment）這兩個座標的焦點上。……由於抒情美典是內省，它的主要描寫對象自是心境，它的主要描寫方法自是象意。」參見高友工撰：《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5月1版1刷），頁90-142。

<sup>59</sup> 參見李孝悌撰：〈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一份（2005年3月），頁96。

## 引用文獻

### 一、傳統典籍

清·王士禛撰，清·惠棟注：《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

\_\_\_\_\_：《池北偶談》，台北：廣文書局，1991年。

\_\_\_\_\_，清·惠棟、金榮注：《漁洋精華錄集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

\_\_\_\_\_注補，孫言誠點校：《王士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_\_\_\_\_，清·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_\_\_\_\_，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精華錄十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二、近人論著

嚴志雄撰：《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出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

蔣寅撰：《王漁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趙園撰：《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_\_\_\_\_：《明清之際的思想語言說》，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王利民撰：《王士禛詩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撰，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在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年。

李孝悌撰：〈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一份，2005年。

- 李明軍撰：《文統與政統之間——康雍乾時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學精神》，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
- 高友工撰：《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 袁書菲（Sophie Volpp）撰：〈如食橄欖——十七世紀中國對男伶的消受〉，收錄在陳平原、王德威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孫康宜撰：〈典範詩人王漁洋〉，收錄在陳平原、王德威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巫仁恕撰：〈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重心〉，收錄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年。
- 范銘如撰：《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導論——看見空間》，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
- 米歇·傅寇（Michel Foucault）撰，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錄載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年。
- 段義孚（Tung Yi-Fu）撰，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 徐國能：〈王士禎杜詩批評析辨〉，收錄在《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
- 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 Structuration and Place：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在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年。
- 阿雷恩·鮑爾德溫（Elaine Baldwin）、布萊恩·朗赫斯特（Brin Longhurst）等撰，陶東風翻譯：《文化研究導論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 麥克·克蘭（Mike Grang）撰，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等譯：《人文地理學 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巨流出版社，2009年。
- 曹淑娟撰：《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
- 張宇聲撰：〈王漁洋揚州文學活動評述〉，收錄在《淄博師專學報》，1996年1月。



- 顧啓撰：〈冒襄王士禛交游考〉，《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2期，2006年。
- 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撰，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 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台北：巨流圖書，2004年。
- 郭紹虞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撰，董建中譯：〈綠楊城郭是揚州——清初揚州紅橋成名散論〉，《清史研究》，2001年。
- 劉錚雲撰：〈「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份，1993年。
- 劉紀蕙編：《他者之域——文化身份與再現策略》，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
- 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撰，王志弘、張華蓀等譯：《第三空間 The Third Place》，台北：桂冠出版社，2004年。
- 鄧之誠撰：《清詩紀事初編卷六——王士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謝正光撰：《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鄭毓瑜撰：〈流亡的風景——〈由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 嚴迪昌撰：《清詩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8年。
- Paul Cloke、Philip Crang、Mark Goodwin 撰，王志弘、李延輝等譯：《人文地理學概論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導論》，台北：巨流出版社，2007年。

